

执行主编/周延良

#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丛 刊

(第二卷)

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信息研究中心 主办  
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 中国古典文献学

## (第二卷)

主编  
周延良 林 弊  
副主编  
杜 勇 高恒文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丛刊（第二卷）

编者：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信息研究中心

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出版发行**

(澳门邮政 1352 信箱)

时代彩印厂 承印



850×1168mm 1/32k 本 7.5 印张 20 万字

2003 年 9 月第一版，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962-8735-04-7

---

定价：澳门币 13 元 人民币 15 元

## **学术顾问委员会：**

**首席学术顾问：启 功**

**主任委员：裘锡圭 安平秋 杨 忠 项 楚**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钦善 刘崇德 来新夏 李学勤 吴 云 许逸民 赵沛霖  
侯忠义 夏传才 曹亦冰 董治安 阎纯德 葛景春 瞿林东**

## **编委会委员：**

**主任委员：靳润成**

**副主任委员：周延良 林 弼 杜 勇 孟昭毅**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润琦 方 宁 王钧林 杜贵辰 张 晶 张海明 张国刚  
汤晓青 郑杰文 杨朝明 赵伯雄 赵敏俐 徐志啸 曹 旭  
郭明志 欧阳健**

## **主 编：**

**周延良 林 弼**

## **副主编：**

**杜 勇 高恒文**

## 卷首语

《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第一卷出版后，虽流播不广，但在有限的学者范围内还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希望即将出版的第二卷也会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并多提宝贵的批评意见。

本卷刊载文章凡 19 篇，除一篇书评，一篇国外中国文献叙录之外，大都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作者都是中青年，是这一领域有造诣的学者群体，其中不乏著名的中年专家。

第二卷设定了六个专栏，自然仍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为主。同时，也刊载了一定篇幅的学术史研究、文化事类、作家作品研究性的文章。

山东大学文哲研究院古籍研究所教授郑杰文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志啸博士各自以《百年墨学研究史略》和《二十世纪楚辞研究代表著作述评》为题对《墨子》和《楚辞》研究的现当代学术史做了简赅的考察。其实二氏均有洋洋大著出版，所刊载的文章是节要言之。就这两篇文章而言，是建立在大量的研究著述实际也就是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做成的。从事学术史研究，需要具备良好而坚实的文献学素养、根基，我们从这两篇文章中是可以看到的。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博士多次讲学德国。他的文章是在德国从事研究工作时对德国国立图书馆所藏中国文献考察后完成的。此文对中国从事文献研究的学者而言是很有启发的。

河北大学古籍研究所刘崇德教授从事词曲文献和古乐谱研究积年，翻译的《九宫大成》曲谱出版，蜚声海内外。其文《关于宋曲曲调之统计》，从文献的角度所考，对这一

领域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如他自己所言：“宋代曲体与词体同源于唐五代之曲子，而流行为两途，前已在《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7月出版）之下编《曲乐今证》第二章《事林广记》所载《唱赚乐谱与宋代曲乐》中有考辨。而宋曲中诸体亦已涉及缠令、缠达、唱赚、诸宫调与戏文等，而如散乐、小唱，以至大曲、队舞乐辞及杂剧等，则或因文献不足，或因其介于词曲两体之间，故尚未论及，俟作进一步探讨。而所及宋曲所用曲调，即曲题名，明以来称作曲牌者，已列166调，共属十六宫调”

辽金文学文献的现代意义的整理和研究是近十几年来的事。对这一文献范畴的基本情况，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本卷刊发了刘达科、王庆生的文章。二氏都是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文中涉及的文献，提出的问题和见解是可领首。

我们在第一卷中设定了从事文学、文化史学和文献学专家简介的专栏。本卷刊登和介绍了郭明志、张晶、张海明三位教授。三位都是从事文献、文学、文化史学有声望的专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文献学不仅具备一个独立学科的条件，同时它也是诸多学科研究的基础——这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希望学人共勉。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对本刊的编辑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天津师范大学领导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学术界各位同仁给予学术方面的襄助，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可能办这样一个刊物！

欢迎赐稿！

编者：周延良

# 目 录

卷首语 ..... (1)

## 学术史论

百年墨学研究史略 (1) ..... 郑杰文

二十世纪楚辞研究代表著作述评 (2) ..... 徐志啸

## 国外中国文献叙录

柏林德意志国立图书馆中国古文献调查记

——以鸦片战争前的图书及其编目为主 (40) ..... 张国刚

## 古典文献学与古籍整理研究

论《汉书·艺文志》序 (52) ..... 郭明志

关于宋曲曲调之统计 (60) ..... 刘崇德

辽代文学史料保存整理述论 (64) ..... 刘达科

《金代文学家年谱》、《金诗纪事》编写整理札记 (84) ..... 王庆生

从明文集的出版看近年古籍整理的状况 (96) ..... 黄卓越

臧懋循改定《元曲选》的时代化与案头化

——元杂剧版本比较(102) ..... 宋常立

## 古代文化事类考与作家作品论

《诗经》“四始”与《周易》“四象” (113) ..... 周延良

荀子的人性论 (136) .....	崔双萍
“文化诗学”视界中的屈原与《楚辞》(142) .....	藏 策
屈原的悲剧精神(160).....	李金善
略论李白葬友的文化意义 (171) .....	陆德海
白居易罢官致仕时间考 (182) .....	李润强
杨万里诗歌的发展历程 (189) .....	张瑞君
晚清“翻新小说”述评 (214) .....	林 弊

## 书评

### 贵 在 探 索

——读《《楚辞·天问》与唐虞三代文明》(222) .....	赵沛霖
--------------------------------	-----

### 学者简介

郭明志教授简介 (228) .....	编 者
---------------------	-----

张晶教授简介 (229) .....	编 者
--------------------	-----

张海明教授简介 (232) .....	编 者
---------------------	-----

### 补白

《宋高僧传》献疑一则 (95) .....	李润强
-----------------------	-----

# 百年墨学研究史略

郑杰文

(山东大学文哲研究院古籍研究所)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墨家学说，战国时曾与儒学并称“显学”。秦汉以降，由于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变化，以及其他种种复杂原因，墨学传习不盛，自战国至元代间 1500 余年，墨学整理作仅出现 10 种（包括佚书）。明代，墨学渐受重视，整理作出现 26 种。清代中后期，墨学复兴，整理作出现了 52 种。特别是毕沅、张惠言、孙诒让等人的校释，校正了大部分错简，提出了墨经“旁行读法”，破解了诸多科技、逻辑论说，使《墨子》成为可读可解之作，为二十世纪墨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本。张惠言、邹伯奇、陈澧等先后以西方科技知识和逻辑知识比附、解说《墨经》，发掘其深邃含义，不但使其义稍可窥知，而且为二十世纪的墨学研究指出了一条可以遵循的研究途径。

二十世纪的墨学研究，正是在上述墨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可以 1949 年为界分为两期。

## 一

1911 年至 1949 年的墨学研究，在清人研究基础上全面展开，于《墨子》整理、墨学史研究、墨学义理研究、墨辨逻辑和墨家科技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五四”前墨学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墨子》整理，除《墨子》文词的诂释中有某些超越清人的地方外，还出现了几种新动向。其一，试图将《墨子》53篇区分为几大类，这便启发了后人对《墨子》篇章的分类研究，为探讨《墨子》篇章的不同作者打下了基础。其二，重视《墨经》的体式研究，如王闿运《墨子注》于《经说》文首字或首二字下空格以识别之，曹耀湘在此基础上更明确提出《经说》文“必取章首字以识别”。其三，对《墨子》之《备城门》以下诸篇特别重视，如大冶县知事尹桐阳在他的《墨子新释》中，结合实际守城经验来注释《备城门》以下诸篇的城守器械和守城战术。其四，由于西方近代研究方法的传入，此时期墨学整理中的综合论说，已呈现出由考据向义理研究过渡状态，如曹耀湘《墨子笺》中各篇末的附论，甚有可取之处。

“五四”后《墨子》整理的显著成就是《墨辩》六篇的整理研究。不但此类著作的数量多（初步统计有28种），而且出现了几部高水平的著述。如谭戒甫以其深厚的中西学知识，特别是对《墨经》持之不懈的数十年研究，使其《墨经易解》的成就受人瞩目。另外，此时期《墨子》全书整理著作虽数量不多，却出现了几部高质量的作品，如张纯一的《墨子集解》发挥和解说句意、段意和篇意，寓义理研究于著作整理中；如吴毓江的《墨子校注》广引明本以校勘文字，超越清儒治墨处颇多。

“五四”前的墨学义理研究，是在前代墨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进步士子倡导以墨家思想启蒙民众，改革现状。他们倡导发扬墨家学说中的民主思想，学习墨家的去私献身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梁启超在《子墨子

学说》中号召学习墨家以“去私”，如觉佛在《墨翟之学说》中以墨家精神“策人进取之心”，易白沙在《述墨》中主张效法墨家的“勇于救国”精神。“五四”反封建、反迷信、倡科学、兴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进步人士倡导墨学当有一定作用。

“五四”后的墨学义理研究，除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外，还有钱穆的《墨子》及冯友兰、郭沫若著述中关于墨学义理的研究。这些著述大多注意在社会文化大背景中寻找墨学产生的原因，探寻墨家精神。有的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成为五、六十年代大陆治墨主流方法的先导。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等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亦应注意。

二十年代的墨辩大讨论和墨子姓氏国籍的大争论，是本世纪墨学研究史上令人瞩目的两大事件。墨辩大讨论发端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列惠施、公孙龙为墨家后学，和梁启超、胡适关于《墨经》牒经字体例及与此相关的《经》文校改问题的通信。两人意见发表后，先后有栾调甫、伍非百、张纯一、张之锐、章太炎、章士钊、汪馥炎、孙碌等参与讨论。讨论和争论的问题有牒经字、旁行读、名墨关系、治墨方法等。讨论分两途，先是有栾调甫、伍非百、张之锐等讨论经牒字、旁行读等《墨经》体例及校释问题，文章发表在北京等地的刊物上；后有章士钊、章太炎、胡适、栾调甫、汪馥炎、孙碌等由讨论《墨经》“辩，争彼也”的校释而及于名墨流别和治墨方法问题，文章主要发表在上海等地的报刊上。通过讨论，使《墨经》体例和《墨经》中涉及的名墨訾应问题研究得以深化。

墨子姓氏国籍的争论发端于 1928 年 4 月胡怀琛发表

《墨子为印度人辨》，先后有郑师许、吴进修、方授楚、陈登源、卫聚贤等参与争辩。争辩的主要问题是墨子是否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是否为佛教徒或婆罗门教徒。争辩以胡怀琛、卫聚贤等为一方，主墨子外来；以方授楚、陈登源等为另一方，主墨子本为中国人。争辩以胡怀琛等显露出世界史知识贫乏而强辩、学界多以墨子本为中国人而结束。

就研究方法而言，“五四”前学者虽依然沿清末开创的借西学知识、西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墨学的旧法，但由于研究者多能对西学知识做到熟练把握，又能融合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较为自然地相融在一起运用，故能将墨学研究推进一步。他们所运用的细密思维解析方法，对下一期的墨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张煊解《墨经》诸方法对谭戒甫《墨经易解》的细密分辨的影响。他们借西方著述方式来表述墨学义理，亦对下一期的墨学义理研究表达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如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

“五四”后的墨学研究方法渐趋多样化，解析法、比较研究法、与社会大文化背景结合的文化学研究方法，在此时期的墨学义理研究中都有运用。《墨辩》研究除了沿袭清末的“以西解中”的旧方法外，还出现了“以中解中”传统方法的回潮。应予特别注意的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中西方法结合的新的解析方法的创立。此著用西方论著的解析方法作为框架，而以中国传统考据方法指导下对文本的深入研究成果作为论述内容，实现了中西方学术方法的合理结合，创立了墨学研究近代化方法，在学术方法上对其后的墨学义理研究影响至深。

此时期墨学研究成就的取得，和墨学研究近代化方法

的确立，与当时学术文化潮流密切相关。接续清末“西学东渐”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与世界学术潮流接轨。新思想的传入启迪着学人们用新的理念去发掘墨学义理，新学术方法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评点式的文化典籍义蕴研究方式。由此时期墨学成果的样式和数量，与清代墨学研究成果数量特别是成果样式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西学理论和学术方法对墨学研究的影响，是多么深广。

正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政治作用需要重新反思一样，对西学理论和方法对传统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也应有充分认识。对西方文化负面作用的反思，发端于梁启超的《游欧心影录》。胡适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也提出整理和保存传统文化精华问题。顾实等在《墨经》研究中的“以中解中”方法的运用，便是这种文化思潮在治墨方法中的反应。中国传统学术论述的特点主要在于它的综合性，用西方盛行的解析方法来加以分解、剖析，虽然对某些具体论述中的具体问题的把握会更加清晰，但却往往破坏了它与其他问题间的有机联系，难以把握它的深厚意蕴。研究结果，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结局。这也是近几十年间，各种新学术方法涌现的直接原因。

此时期墨学研究成就的取得，还由于政治对学术的较少干预。1900年至1949年是一个战争、动乱的年代，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混战；执政者更忙于用政治手段或战争手段来对付政敌，还未像秦皇汉武那样腾出手来控制学术。因之，学者可凭自己的爱好，依据自己的学业基础，去自由地选择学术研究，所以出现了墨学研究全面展开的局面。

大学的创立是此时期墨学研究成果丰硕的又一重要原因。名牌大学都注意延聘名教授。名教授的成名不主要在于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和讲授表达效果如何，而在于学术造诣的深浅，和学术影响的大小。有真才实学者被重用，如李调甫从门卫一下子变成受人尊重的教授，这成为学人倾心于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此时期儒学地位的降低，促进了墨学的社会地位提高，使之成为受学人关注的学问之一。特别是《墨辩》六篇，又有一定的学术难度，因之不少大学教授去专攻墨学，以求成名，也促进了此时期墨学研究的发展。

学术研究需要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这是此时期墨学研究成果给我们的启示。学术研究又需要深入扎实的潜心努力，这是李调甫、谭戒甫那独领群雄的墨学研究成果给我们的启示。学术研究需要深厚的功底，更需要合适的学术方法，这是胡适别开生面的墨学研究成果给我们的启示。

二

1950 年至 1999 年的墨学研究，可以大陆“文革”结束、两岸交流甫始为界来考察。

两岸交流前，大陆与港台的墨学研究，在研究类别上面各有侧重。在综合研究方面，大陆著作数量远远少于港台著作。在思想学说方面，大陆墨学综合研究著作中仅有任继愈的《墨子》值得重视。综合研究之外，港台此期的墨学研究中引人注目者应属墨学专题研究。在社会政治学说研究方面，有张幸助的《墨子社会思想》、孙广德《墨子

政治思想之研究》；在学说比较研究方面，有陈拱的《儒墨平议》、王冬珍的《名墨异同考辩》；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有周富美的《墨子假借字集证》和《墨子虚字研究》；可谓门类多样。而此一时期大陆墨学研究专题研究中最有成就者当属墨辩研究。在墨辩综合研究方面，有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诂》；在墨家逻辑研究方面，有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汪奠基的《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在墨家科技方面，有陈奇猷的《墨子的科学——力学与光学》。

就墨学义理研究看，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无一例外地重视其社会学说、逻辑与科学论说的研究。但两地又各有侧重，大陆多墨辩逻辑与墨家科技研究作，港台多墨家社会学说研究作。个中原因，主要是两地不同政治环境下对传统文化的不同认识。台湾曾出现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欲以传统文化精神改进社会弊端，所以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墨学社会学说研究，欲以墨家优秀学说补充儒家学说之不足，以更好地教化民心、改造社会。大陆虽也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态度，号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在“精华”与“糟粕”的具体区别上难有既定的准则，使研究无所适从；加之阶级斗争的影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学者动辄得咎，故谁也不愿自己倾注心血的研究成果成为“复辟封修资”的证据，所以多选择那些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论说作为研究对象。

1949年后，大陆台湾虽然两岸阻隔，但却乘传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延续着同样的民族文化。所以两地在墨学研究方法方面，更多地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两地学者在墨学史研究和《墨子》校

释方面，基本都运用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方法。如大陆任继愈《墨子》第一章关于墨子生平、墨子著作、墨家学派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书证来确定《墨子》53篇的作者。（二）两地学者在墨学义理研究中，大都运用近代西方传入的解析归纳法。如汪奠基《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主要依据《墨辩》原文立论，他把《墨经》181条解析为20章，逐条分析解说；对其《大取》、《小取》思想体系的研究亦用此法。而台湾学者如严灵峰《墨子简编》也是选取了《墨子》“十论”的主要篇章，通过分段校释、解说其意来把握墨家社会思想学说的。（三）两地学者在墨学义理研究中都曾使用比较法。如詹剑峰《墨子的形式逻辑》第五章连举《墨子》论辩6例来与“因明三支式”比较，证明《墨子》书中论辩形式有与“三支式”相同者；连举《墨子》论辩12例；米与逻辑三段论比较，证明《墨子》书中论辩形式有与三段论相同者；以此来证明“墨子及其门徒是精于逻辑的”。而台湾史墨卿《墨学探微》中关于墨家之“天”之“德”的论说，也是先举前人、时人之论，来比较墨家论说与他们的同异，以明墨家此说的渊源、发展和影响。

就墨学研究方法来讲，大陆、港台两地学者共同使用考据法、解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等。这主要出于对旧有研究方法的延续。但是，大陆与港台又有不同的现实社会环境，处于不同的文化政策下，所以两地墨学研究中又出现相异的研究方法。大陆方面，由于思想路线的偏差，繁琐考据和实验主义作为封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受到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奉为主臬；历史反映论、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唯一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被推行到全国。此种学术

风潮发展的极端是理论先行。具体到墨学研究中，即先设计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从《墨子》中寻求材料，强作解释，去填充“证据”。如詹剑峰的《墨子的形式逻辑》，便是依据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按照西方近现代逻辑教科书的论述结构，去图解墨辩逻辑。台湾学者更重与现实社会问题的结合，当与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关。另外，有的台湾学者在墨学研究中将墨家学说与西方宗教学说作比较研究，这与台湾自由的宗教信仰政策有关。

“文革”结束，大陆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形势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墨学义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墨家综合研究作和墨家社会思想研究作即出版了30种。其中，杨俊光《墨子新论》、孙中原《墨学通论》、谭家健《墨子研究》，都是甚应关注的力作。台湾墨学研究中，出现了陈问梅结合心学研究墨学、和王讚源结合企业管理研究墨学的新动向。

大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政策，使得某些地方政府出资支持地域文化研究。在山东大学教授张知寒先生推动下，山东大学与山东滕州联合成立墨学研究中心，召开过五次大型墨学研讨会议，制造了很大声势，推动了墨学研究的发展与普及。在郭成智先生奔走下，河南鲁山也出现墨学研究热，召开过大型墨学研讨会。

此时期墨学研究的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大陆“拨乱反正”的新形势影响到墨学研究界，学者们重新使用二、三十年代中西结合的解析、考据方法研究墨学义理。由于没有新材料，使用旧方法，所以此时期墨学研究大多综合前人旧说，在思想观念上没有重大创新。台湾出版的几种有影响的墨学综合研究作多为大学讲义，论述面面俱